

海外并购、逆向知识转移 与创新绩效

吴先明 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并购、逆向知识转移 与创新绩效

吴先明 等◆著

F271.4
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吴先明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4257 - 8

I. ①海… II. ①吴… III. ①跨国公司—企业合并—研究—
中国 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研究—中国 ③跨国公司—企
业绩效—研究—中国 IV. ①F279. 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666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
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10YJA630171）的部分研究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创造性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运作推进机制研究”（12AZD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逆向知识转移研究”（11BGL044）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10YJA630171）课题组人员名单

课题负责人

吴先明

课题组成员

杜丽虹	周伟	苏志文	杨兴锐	胡翠平	胡冬红
张翔	邵福泽	伯拉	冯梅	张建文	朱瑶
张雨	黄春桃	谢慰云	吕蕊	梅诗晔	

目 录

第一章 制度环境与进入模式.....	1
第一节 中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与东道国制度约束.....	1
第二节 制度理论与研究设计.....	3
第三节 数据、测量与模型.....	8
第四节 实证分析结果	12
第五节 结论与实践意义	18
第二章 跨国并购中的逆向知识转移	21
第一节 我国企业知识寻求型海外并购	21
第二节 海外并购中逆向知识转移机制	23
第三节 样本、数据与分析方法	32
第四节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38
第五节 基本结论与实践意义	45
第三章 知识寻求型海外并购与创新绩效	50
第一节 海外并购与创新：流行战略与理论争议	50
第二节 知识基础观与知识寻求型海外并购	52
第三节 后发企业的海外并购与创新绩效	54
第四节 知识寻求型海外并购中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56
第五节 数据收集和方法	61
第六节 实证分析结果	69
第七节 讨论与结论	76
第四章 跨国并购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	81
第一节 技术追赶理论对海外并购的忽视	81

第二节	动态能力视角的后发企业技术追赶	83
第三节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87
第四节	数据分析过程	90
第五节	研究发现与理论模型	97
第六节	结论与意义	107
第五章	海外并购与企业价值	109
第一节	海外并购的价值创造与价值破坏效应	109
第二节	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潜力	111
第三节	影响跨国并购中价值创造的因素	113
第四节	样本、数据与方法	116
第五节	实证结果与讨论	120
第六节	结论与建议	126
第六章	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	128
第一节	“走出去”战略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	128
第二节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130
第三节	数据与研究方法	136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143
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	152
第七章	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海外并购的绩效评价	156
第一节	创造性资产与跨国并购	157
第二节	跨国并购绩效评价研究	159
第三节	跨国并购企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	161
第四节	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计算方法	162
第五节	研究假设	165
第六节	分析模型与数据来源	169
第七节	数据分析	174
第八节	结论	189
参考文献		190

第一章 制度环境与进入模式

第一节 中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 与东道国制度约束

中国企业国际化大潮初起，这些快速成长的后发企业正以全球竞争参与者的雄心进入陌生的海外市场。不管是联想收购 IBM PC 业务，还是三一重工在印度、美国、德国和巴西建立制造和研发基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已清晰可见。然而，由于经验的缺乏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复杂性，中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许多困难与挫折。例如，中海油在竞购优尼科（Unocal）公司时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反对；华为在收购 3Com 和三叶系统公司（3 Leaf Systems）时也遭到 CFIUS 的反对；上汽在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时遭到双龙工会的强烈抵制；同仁堂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则面临西方国家对中医、中药的怀疑和排斥；小肥羊在国际扩展中因文化和口味的差异不得不退出大部分海外市场。这些案例对刚刚开始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无疑具有警示作用：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环境的差异。那么，究竟应如何理解制度环境差异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呢？

对进入模式选择问题的早期研究偏向于采取 Dunning 的折中理论^①或交易成本理论，如 Gatignon 和 Anderson (1988)、Agarwal 和 Ramaswami (1992)、Kim 和 Hwang (1992) 等人的研究。然而，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有其

^① Dunning (1977) 的折中理论是在整合 Hymer (1976) 的垄断优势理论、Buckley 和 Casson (1976) 的内部化理论和当时不太成熟的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又称折中范式 (eclectic paradigm)。其中，Buckley 和 Casson (1976) 的内部化理论即是将交易成本理论用于解释跨国企业的国际扩张。

固有缺陷，它对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往往是不够明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学术界开始引入制度理论来解释企业的进入模式决策。制度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的行为，以及企业如何适应制度规则以获得合法性。制度环境通常由规则、规范和价值观所构成，当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时，这些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会形成一种嵌入同构压力（*embedded isomorphic pressures*），对企业进入模式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Brouthers, 2002; Slangen and Tulder, 2009; Guler and Guillén, 2010）。本章将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这里所指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模式的选择问题，即新建还是并购？二是所有权模式的选择问题，即独资还是合资？进入模式的选择不仅关系到母公司的全球竞争力（Root, 1987），而且关系到子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经营绩效（Gielens and Dekimpe, 2001; Canabal and White, 2008）。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企业，特别是一些旗舰企业，如海尔、联想、TCL、华为、中海油、中铝等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及其成功或不太成功的并购活动，代表着一股新的力量进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Morck et al., 2008）。Buckley 等（2007）运用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文化的接近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仅是企业实现国际化学习和成长的内在需要，而且是相关企业与国内外制度环境互动的结果（阎海峰等，2009）。案例研究显示，华为公司早期选择进入亚、非、拉国家，待技术和国际化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这可能是其国际化成功的重要原因（许辉等，2008）；于开乐、王铁民（2008）对南汽并购罗孚的案例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张建红等（2010）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发现交易双方政治体制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是影响海外并购成功率的主要因素。李平、徐登峰（2010）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技术优势、公司国际化程度对企业选择并购方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道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选择并购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距离、产业壁垒对进入方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虽然学术界日益重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是描述性的或是案例研究，少量的实证研究则主要运用宏观数据或上市公司数据。在进入模式选择方面，李平、徐登峰（2010）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正确地选择逻辑回归分析方法。但他们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没有考虑进入模式中所有权模式的选择；二是忽略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正式制度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针对目前的研究状况，本章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其一，通过理论分析，提出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制及其分析框架；其二，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建立模式和所有权模式两个方面分析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其三，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决策中如何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提出建议。

第二节 制度理论与研究设计

一 理论框架

North（1990）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形成了人们之间的互动。North 将这些限制性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限制，如政治、司法条例、经济规则和第三方执法；另一类是非正式限制，如公约、行为守则和行为规范。制度减少了人们和组织互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其他个人或组织的行为。North 强调，规则和程序发展而不是限制经济活动，它简化了个人或组织破译环境的过程，提升了交易价值，否则这些交易将不会发生^①。有关制度的一个广泛接受的定义是由 Scott（1995）提出的。Scott 特认为，制度由认知、规范、调控结构和活动所构成，它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意义。制度传递的载体有多种，包括文化、结构和惯例，它们在不同的管辖层次上进行运作^②。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它必须嵌入制度环境之中。企业的制度环境通

^① North（1990）这里所分析的组织不仅包括企业，而且包括政党、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和文化组织。

^② Scott（1995）将制度力量概念化为三个不同的群体：调节、规范和认知。调节力量包括法律和规则；规范力量包括价值观和规范；认知力量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框架和构想。

常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它由结构、标准和过去设立的做法所构成（Meyer and Rowan, 1977）；另一类是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它由其他组织如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和监管机构所构成（DiMaggio and Powell, 1983；Granovetter, 1985）。制度具有国家属性，即这些减少经济活动不确定性的游戏规则随着国家边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组织将会遭遇环境的复杂性，这种环境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本土的知识和技能不能被完全破译（North, 1990）。

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献里面，DiMaggio 和 Powell (1983) 识别出制度扩散的三种机制：强制（coercive）、规范（normative）和模仿（mimetic）。其中，模仿同构压力（mimetic isomorphic pressures）的影响受到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学者的格外关注。沿着这一线索，一些学者研究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如何寻求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包括在母公司眼中的合法性和在东道国制度情境下运营的合法性（Kostova and Zaheer, 1999）。合法性被定义为“一个总体的看法或假设，即一个实体的行动在由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构成的某些社会结构体系中被看作是可取的、适当的或适宜的”（Suchman, 1995）。它反映了合法化企业行为与一群合法化参与者共同信念之间的协调。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往往选择符合制度压力的要求，通过模仿成功企业流行的组织行为和结构，获得当地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Henisz and Delios, 2001；Kostova and Roth, 2002；Lu, 2002；Yiu and Makino, 2002；Chan and Makino, 2007）。许多学者强调进入模式选择中的合法性动机，并实证检验了模仿在进入模式选择中的作用（Lu, 2002；Yiu and Makino, 2002；Chan and Makino, 2007）。

然而，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一些国际商务领域的著名制度学者开始重新检验他们早期著作的基本假设（Kostova, Roth and Dacin, 2008）。他们认为，虽然跨国企业确实呈现出一些同构的迹象，但这可能是企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获取合法性的需要。在许多制度情境中，跨国企业拥有与当地制度参与者同样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参与者的差异可能会受到重视，而不仅仅是它们适应当地行为规范的能力，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当地的多样性。这一观点代表了制度研究中思想的变化，即由强调跨国公司子公司对当地制度的嵌入转向强调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积极行动。

为了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需要将学术界不同的观点整合成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进而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笔

者认为，可以将 DiMaggio 和 Powell (1983) 提出的制度扩散的三种机制与 Scott (1995) 提出的制度的三个维度，即调节维度 (regulative dimension)、规范维度 (normative dimension) 和认知维度 (cognitive dimension) 进行整合，并将跨国企业的能动性因素考虑进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斯科特提出的制度的三个维度与 DiMaggio 和 Powell 提出的制度扩散的三种机制在分类标准和概念含义上基本一致，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比较而言，Scott 提出的调节维度比 DiMaggio 和 Powell 提出的强制机制在概念上显得更为准确，因为它包含了限制性制度安排和激励措施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在外资政策方面，激励措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DiMaggio 和 Powell 提出的模仿机制相对于 Scott 提出的认知维度在定义和实际操作上显得更为清晰和具体。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调节机制代替强制机制，用模仿机制代替认知维度，形成由调节机制、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组成的制度环境框架。在这一框架中，跨国企业的能动性因素通过内部制度环境中的模仿机制发挥作用，包括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和跨国企业内部对成功进入方式的模仿。

依据上述思路，本章将从调节机制、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三个维度展开对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影响的研究。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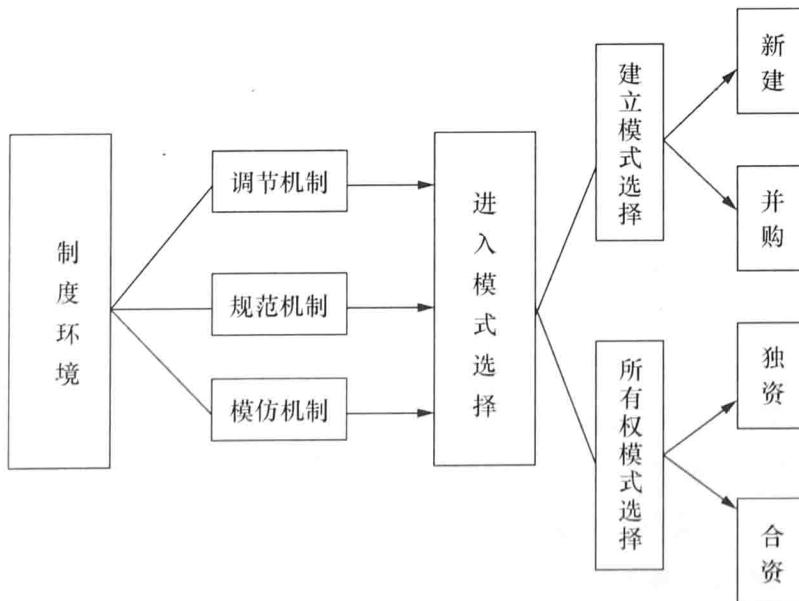


图1-1 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二 研究假设

(一) 调节机制与进入模式

制度环境中的调节机制通常以一种正式制度的形式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调节机制包括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形态。调节机制提供了东道国的游戏规则和公司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North, 1990）。当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它必须慎重处理与各种合法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合法化参与者，它可以制定政策或法规，限制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的并购或对外资进入特定行业进行股权限制。在另外一些国家，这样的限制可能非常少，跨国企业的进入模式会受到其他的合法化参与者，如供应商集团、工会、行业协会等的影响（Westney, 1993；Kostova and Zaheer, 1999）。

在制度理论所强调的法律与政治因素中，法律调节是跨国企业面临的最为强大的环境压力（Scott, 1995）。法律规则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设施，它代表了交易的自由和产权保护的状况，以及政府和法律过程的透明度（Globerman and Shapiro, 2003）。法律规则对于跨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建立了减少不确定性的稳定结构，从而有利于保护跨国企业在当地的权益；另一方面，它也会成为一种阻碍因素，限制跨国企业的进入或限制跨国企业的进入模式。与此类似，政府政策也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限制性政策；另一种是刺激性政策。限制性政策会使企业感到某些进入方式可能不受欢迎，并选择低控制水平和低资源承诺的进入方式（Kim and Hwang, 1992）。相反，如果东道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性政策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低控制水平的进入模式可能会限制企业获取收益的能力，或者不得不与其他合作伙伴分享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可能会选择高控制水平的进入模式（Grewal and Dharwadkar, 2002；Ma and Delios, 2007）。因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1：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调节机制的效率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并购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假设 1.2：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调节机制的效率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独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二) 规范机制与进入模式

规范机制对于作为社会意义和社会秩序基础的道德信念和内在义务给予优先顺序（Scott and Christensen, 1995）。组织行为不仅要考虑自己的

利益和便利，而且要考虑到其他人的期望和内化的行为标准（Scott, 1995），因此，决策往往带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Simon, 1959）。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Kogut and Singh, 1988）。研究显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的相似性会促使跨国企业较早地进入和采取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可以很好地理解当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较少需要当地伙伴的帮助（Gatignon and Anderson, 1988；Kim and Hwang, 1992）。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的经营行为受到母国社会特征的影响（Kogut and Singh, 1988；Tse et al., 1997）。许多进入模式的研究通过文化距离这一指标将某些外部不确定性进行结构化和测量，这时候文化距离被当作制度环境中的非正式部分（Hennart and Larimo, 1998）。按照 Hofstede（1980）的分类，国家文化可以从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PD）、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IDV）、男性化（masculinity, MAS）和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UA）四个维度来测量。Kogut 和 Singh（1988）提出了一个公式，可以将 Hofstede 四个文化维度的记分换算成一个统一的文化距离指数，其公式如下：

$$CD_j = \sum_{i=1}^4 \{(I_{ij} - I_{iN})^2 / V_i\} / 4$$

其中， CD_j 是东道国 j 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I_{ij} 是东道国 j 在第 i 个文化维度上的记分， I_{iN} 是母国在第 i 个文化维度上的记分， V_i 是每一个文化维度记分的方差。

据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3：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大（规范机制的作用力越强），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假设 1.4：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大（规范机制的作用力越强），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三）模仿机制与进入模式

制度理论的模仿机制解释为什么跨国企业在国际扩张中总是使用相同的进入模式。根据 North（1990）的观点，组织倾向于使用一致的海外投资模式。研究显示，日本跨国企业在进入模式选择上表现出很强的组织内部模仿行为（Lu, 2002），Davis 等人（2000）将这种行为称为“父母同构”（parent isomorphism）。跨国企业拥有内部的制度环境，这种内部的制度环境定义了行为的适当方式（Westney, 1993；Kostova and Zaheer,

1999)。当跨国企业国外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时，跨国企业会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国外子公司在规范与行动上符合母公司的要求；而当子公司被赋予较高的自治权时，这种压力会减小。因此，这种内部的一致性和合法性会驱使跨国企业采取独资或合资的进入模式(Davis et al., 2000)。因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5：母子公司一体化程度越高（内部模仿机制的作用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假设 1.6：母子公司一体化程度越高（内部模仿机制的作用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以独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除了组织内部的模仿行为之外，当跨国企业缺乏经验，而且当地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跨国企业会模仿其他企业（同行或竞争者）的进入方式。不确定性鼓励模仿。后来者模仿先行者的进入模式可以降低进入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这种模仿行为可以大致分为基于频率(frequency-based)的模仿和基于特质(trait-based)的模仿(Haunschild and Miner, 1997)两种类型。基于频率的模仿意指跨国企业模仿其他企业广泛采取的进入模式；基于特质的模仿则关注被其他成功企业所采取的进入模式。被其他企业广泛采取的进入模式和被其他成功企业所采取的进入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了模仿的理由。因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7：企业国际化经验越少（模仿同行或竞争者的可能性越大），越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假设 1.8：企业国际化经验越少（模仿同行或竞争者的可能性越大），越倾向于以合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

第三节 数据、测量与模型

一 数据与样本

本书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国家层面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①和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记分^②，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问卷调查。笔者从

①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② http://www.geert-hofstede.com/hofstede_dimensions.php

商务部网站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① 中随机选取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865 家，然后通过信件、电话或电子邮件与这些企业进行联系，共有 283 家企业表示愿意参与调查。调查问卷在发放之前先在研究人员和部分经理人员中进行了认知性访谈和测试，在对少数表述和文字进行修改之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接受调查企业的经理人员。最后共收到有效问卷 243 份。调查样本的行业与地理分布如表 1-1 和表 1-2 所示。

表 1-1 调查样本中跨国企业的行业分布

主要行业	跨国企业数	百分比 (%)
采矿业	35	14.40
制造业	185	76.13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	1.65
建筑业	1	0.4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	2.0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9	3.70
住宿和餐饮业	4	1.65
合计	243	100

表 1-2 调查样本中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分布

地理区域	海外子公司数	百分比 (%)
亚洲	84	34.57
非洲	21	8.64
欧洲	52	21.40
北美	41	16.87
拉美	24	9.88
澳大利亚	21	8.64
合计	243	100

为了检验调查样本的代表性，笔者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随机抽取样本进行 T 检验。检验的指标包括企业销售额和员工数。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调查样本与比较样本在销售额指标均值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0.63$, $df = 242$, $p = 0.53$)，在员工数指标均值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0.67$, $df = 242$, $p = 0.50$)。笔者进一步检验调查样本

① <http://hzs.mofcom.gov.cn/>.

的可靠性。可靠性统计显示，调查样本的信度系数为 0.92（销售额）和 0.77（员工数）。相关分析显示，两组样本销售额指标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85 ($p < 0.01$)，员工数指标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63 ($p < 0.01$)。检验结果表明，调查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二 测量

（一）因变量

因变量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外子公司建立模式选择；其二是国外子公司所有权模式选择。进入模式是虚拟变量，在建立模式中，新建用 1 表示，并购用 0 表示；在所有权模式中，独资用 1 表示，合资用 0 表示。

（二）自变量

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笔者选择如下四个自变量分别对制度环境中的调节机制、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进行测量：

1. 东道国治理品质

制度环境中的调节机制用东道国治理品质进行测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包括 212 个国家和地区 1996—2008 年间的总计和单项治理指标。WGI 由公民呼声与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与暴力缺失（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规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六个维度构成。本章将从总体（六个维度记分的平均值）和各单个维度分别检验其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2. 文化距离

制度环境中的规范机制用文化距离进行测量。数据来源于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记分。Hofstede 的文化维度记分包括 69 个国家和地区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化、不确定性规避四个方面的记分。本章采用 Kogut 和 Singh (1988) 的公式对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记分进行综合，计算文化距离指数，用以测量规范机制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3. 母子公司一体化程度

用母子公司一体化程度测量企业内部制度环境中的模仿机制。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本章从三个方面测量母子公司一体化程度：（1）母子公